



如果要我给自己安一个“专栏作家”的头衔，估计已经问题不大了——我在京沪报刊上写专栏已有30年历史，前后写过的专栏不下20个，目前仍有两个历史最长的专栏继续在写。其间有故事，有感动，也有趣事，或可与读者分享一二。

我的30年专栏岁月

江晓原



我的第一个专栏始于1993年1月，是北京的杂志《中国典籍与文化》月刊上的“古天学从谈”。这专栏原是杂志社约先师席泽宗院士写的，他那时因手头有许多学术任务，还担任着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等行政职务，分不出精力，就向杂志社推荐了我。当时我还从未写过专栏，见猎心喜，欣然领命。那时我博士毕业4年，刚刚成为天文学史专业的“熟练工”，就试着将自己学习、研究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一个一个通俗化，这个专栏持续写了5年而罢。

1999年初我调入上海交通大学，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社会活动大为增加，找我写专栏的京沪报刊逐渐多起来，甚至到了“络绎不绝”的光景。其中在《人与自然》杂志上的摄影专栏“幻影西欧”，相当奇特。

我原先对摄影毫无兴趣，也毫无造诣，旅游时别人让我帮忙拍照，我往往拍不好，我多年的哥们清华大学的刘兵教授为此经常嘲笑我。2004年我偶有机会去欧洲从北到南漫游一个月，就带了一架廉价的数码相机在身边，一路上胡乱拍照。《人与自然》原是云南的旅游杂志（月刊），但那时有投资方进入，在北京组建了编辑部，主编有一天在席间听我说去欧洲拍了3000多张风景照片，就让我找几张给他看看。我不知他的用意，就回家随机找了10张给他看，并告诉他这是随机抽选的，既非最差，也非最好。

结果他让我试着给《人与自然》写6个月摄影专栏，我犹犹豫豫地答应了。想到我很烂的摄影技术，怎样才能“扬长避短”呢？我除了尽量挑选构图和质量比较好的照片，每次10张至15张，还让它们每次构成一个主题，比如“穹顶”“夕照”“灭点”等等，再配上简要的文字说明。写了6个月，主编要求我续写6个月，之后又要求我再写6个月。这样写到18个月，我的好照片差不多都用完了，正要向主编告停，主编却通知我他要卸任了，于是专栏正好圆满结束。

这18个月摄影专栏我挣了2.7万元稿费，对当时一个菜鸟摄影者来说，这已经挺让我高兴了。但更让我高兴

的是刘兵教授听闻此事后的反应，他瞪大眼睛说：你也能写摄影专栏？哈哈，现在在18册印刷精美的杂志作证，他只好承认我的摄影技术是真进步了。他问我是怎么进步的，我如实告诉他，我从未看过哪怕一页摄影技术的书，作为一个影迷，我只是在拍照时尽量模仿和借鉴我在电影里看到的各种场景。刘兵想了一下，说：这倒是一个合理的解释。

2002年，有人来找我写我迄今持续时间最长的专栏了。从2002年10月起，我应邀在《文汇报读书周报》上特约主持“科学文化”专版，每月一次，这个版面每次包括三部分：我和刘兵教授的“南腔北调”对话专栏、一篇书评、三种新书简介。2015年《文汇报读书周报》在新媒体冲击下遗憾关闭，这个“科学文化”专版移到了《中华读书报》，版面的序号也接续下去，改为逢双月出版，但每次的版面篇幅增加了一倍，持续至今，我和刘兵教授的对谈也持续至今。

我们所谈的书籍，完全由我和刘兵两人商定，专版上的书评则由我选定书籍后约作者撰写，新书简介由我自己撰写，这些全都不受书籍出版社的任何影响，所以是真正的“独立书评”。我们选书的标准，是兼顾书籍的思想价值、公众的阅读趣味，当下的热点话题。

这个“南腔北调”对话专栏，至少就持续时间之长而言，或许在“专栏史”上也可以有一席之地了。这个专栏已经有过4次集结：

江晓原、刘兵：《南腔北调：科学与文化之关系的对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江晓原、刘兵：《温柔地清算科学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江晓原、刘兵：《“南腔北调”百期精选》，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

江晓原、刘兵：《新南腔北调集》（三卷本），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21。这是“南腔北调”对话专栏18年的完整集结。

许多朋友对我们两人对谈的工作过程感到好奇。实际情形是这样：每次我写一段，从网上传给他，他加上一段，再从网上传给我，如此反复若干次，完成对谈。每次都是我开头，他结尾，20

年来没有改变过。这种做法有几个好处：一是可以充分利用零碎时间，忙里偷闲进行；二是两人相互启发，相互刺激——因为在写自己这一段时，不知道对方下一段会写什么，所以写作过程中就会有相当的随机性，偶然性，或者说不确定性，这种感觉和一个人埋头写一

媒体朋友问我：你怎么可能将一个专栏写到那么久？能够持续到16年之久的“不被榨干之道”，无他，但勤读书，勤想问题尔。如果说还有什么秘辛的话，就是：身边要经常有愿意并且能够和你讨论问题的朋友。

篇文章是很不一样的。

但是这种工作方法并非任意两个人之间都可以使用——我和好几个朋友做过对谈，但是有的灵感如泉、文章锦绣的朋友，却不适应我和刘兵之间的工作方式——他们或是一口气就将自己要说的话全部说完，或是不分你我，自己一写就已写成一篇锦绣文章，这样就无法享受两人对话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了。

有些专栏开始写的时候并无宏大计划，后来却意外结出了硕果。比如在《中华读书报》上持续数年的科幻影评专栏“幻影2004”，2004年开始写这个专栏时，我刚刚成为科幻影片的菜鸟影迷，但随着越读越深，我逐步将对科幻影片的兴趣学术化——发表CSSCI论文、出版学术专著、指导中国第一个对科幻进行科学史研究的博士生等等。这位博士生毕业后，成为我的同事，又成为我长期合作的学术拍档。“幻影2004”专栏中的影评文章，后来大部分收入了《江晓原科幻电影指南》一书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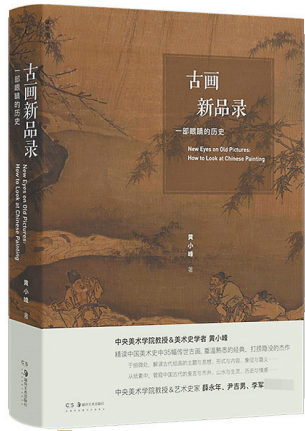
在月刊《博览群书》杂志上的“脉望夜谭”专栏，我自己非常喜欢。这个专栏专用来表现我身上好古成癖和不务正业两大毛病带来的“恶果”。脉望者，书虫也；夜谭者，夜深人静之际娓娓闲谈也。“脉望夜谭”是一个爱书之

人所讲述的种种与书有关的逸闻趣事，书多稀见奇特之书，人皆与众不同之人，事皆亲身经历之事。所谈之书与人，都是大牌而已经不甚流行或特别有名了。这种原则，最初只是追求专栏特色，后来受到一小部分读者喜欢，时加鼓励，自己也感觉有些趣味，就散帚自珍延续下来。后来我又应邀将“脉望夜谭”专栏换到了《第一财经日报》上。这个专栏最后集结为《脉望夜谭》（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7）一书，装帧素雅可人，成为特别适合送朋友的一本小书。

我至今仍在继续写的另一个专栏始于2006年，是在法国流行杂志《新发现》中文版上的“科学外史”专栏，每月一次。这个专栏在持续时间长度上是第二名，却是我写得最用心的专栏。16年来，我的“邻居”（该杂志中文版有30%本土内容，包括三个专栏）换了一茬又一茬，我的责编换了一位又一位，在第五位责编任上，她通知我，出版社和法方的合作将在2021年底结束。于是从2022年1月起，专栏转移入《第一财经日报》，名称是“科学外史II”，仍是每月一次，有了了同步的新媒体版本。

“科学外史”专栏已集结过多次，书名就叫《科学外史》，2013年复旦大学出版社第一次集结就荣膺首届“中国好书”25种之一，获得多重荣誉，成为“双效益”图书。最新的结果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的三卷本，收入了专栏2006年至2018年间的全部内容。

多次有媒体朋友问我：你怎么可能将一个专栏写到那么久？通常情况下，作者写个一年半载，就会有被“榨干”之虞，每月要定期交出一篇文章，能够持续到16年之久，确实比较罕见。现在回顾起来，当初将专栏取名“科学外史”，还真有些意想不到的好处。这个名字高度开放，可以容纳几乎一切与科学有关的事情、人物、概念，它允许作者在许许多多迥然不同的场景中随意跳转，选择话题，这非常有助于专栏内容的多样性和趣味性。至于我的“不被榨干之道”，无他，但勤读书，勤想问题尔。如果说还有什么秘辛的话，就是：身边要经常有愿意并且能够和你讨论问题的朋友。



中国古画的观看之道

姜超

带着问题出发的古画阐释，总有出人意表的新意奔腾纸上，颇有感官先于思想得到表达的趋势。《古画新品录——一部眼睛的历史》是一部充满机趣、智慧的中国古画艺术阐释之书。

中国古代绘画是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藏着丰富的宇宙奥秘和人生故事。中国画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却始终洋溢着无限的生气，在斯人已逝的千百年之后，顾恺之、阎立本、黄公望、徐渭、唐寅、张择端、八大山人等丹青妙手各怀其技而作品流传后世。进入一幅中国画，既简单又困难。简单的是你可以不需要任何专业基础，可以领略王希孟《千里江山图》的形胜、韵致，也能获悉张择端五米长卷《清明上河图》描绘的东京繁荣景象；当然也有欣赏上的困难，诸如實體撞白“状貌古野”的罗汉，满幅展示的都是人像而留白甚少，这种冲破经验真实的处理，与他临济禅印心法物我一休；再如，八大山人《山水鱼鸟图册》里的作品令人费解，有的画作呈现的是鱼和鸟的结合体，带给观者强烈的奇异感。

走近中国绘画的方式有很多，如何才能有效理解这项神圣的艺术实践呢？《古画新品录——一部眼睛的历史》别出机杼，能满足观者对中国画的各种好奇。作者黄小峰宣称——可千万别误以为看一幅古画需要这么多的前提。

理论上讲，只要带着自己的眼睛就行。作为专业解读，黄小峰在书中突出对古画的价值判断。中国古代文士在创作时，既参同造化，也注重心境传达。他从画家的精神个性出发，展现他的人生经历，知人论世的路数虽然古老，但选择后的细节切入，是了解画家画作最佳的选择之一。比如，八大山人从其中期风格开始，画风从早期的中规中矩转为出人意表的怪异笔墨，《安晚帖》的八哥之眼让人观后心里一震，觉得有一种格格不入的精神充盈在画作之间。同理，牧溪的《叭叭鸟图》里怒目圆睁的八哥也带着视觉指示，八哥的姿态，究竟是在打盹，是在整理羽毛，还是在沉思？黄小峰对古代画家心中的悲苦掏一掏洞，认为新世荒野的人们，终究可以寄身于艺术世界里。

“留存至今的古代绘画，往往都有重重迷雾，今天看来，有如雾里看花”。黄小峰深知这一点，深入浅出地介绍中国画的风格演进、精神之路。《古画新品录——一部眼睛的历史》采取的是以点带面的漫游方式，围绕35幅作品涉及的皇官、市井、生灵、山水、历史、眼睛、身体等漫游其间，解读古画的内容与形式、象征与隐义。他首先注重观看的视角，引导读者在凝视中国画的时空里提出自己的疑问，然后向问题寻找答案，从而挖掘出古画里深藏着的“耳目一新”。在解读中，黄小峰尤重捕捉古画藏着的细节，通过深究局部的处理来探索微妙的意义。创作一幅作品，是一个发现意义、涌现情思、诉诸技法的过程；而解读一部作品，也需要敞开襟抱，在线条勾画、皴染布局之间思索，领略优秀画作凝聚的思想与敞开的美。

在漫长的绘画历史中爬梳，黄小峰既向读者介绍古画中的“珍珠”，也选艺术史上的“遗珠”，他的选择首要遵从“一些新的刺激”“激发新的问题”。当然，他最想突出的是自己的眼光，也就是直观的感受。他强调要用“细读”和“超细读”作为阅读的一种方法，还特别在意阅读古画时做到深入“视觉情境”。比如，他从虚实关系入手，对北宋画家李公麟《五马图》展开分析，紧紧揪住“李公麟为何要画这五匹马？为谁所画？五匹骏马究竟具有怎样的含义？”黄小峰考察了史实，通过历史与作品描绘的对比，翻检出一个事实——“五匹马中有两匹与史实不符，一匹没去过开封，另一匹可能根本就不存在，另外三匹同样值得怀疑。”接下来，他用一根针挖一口井的功夫，将图中的马与皇宫的养马情况相对照，尤其从视觉情境深入发问，论证得出李公麟画作透露出郁郁不得志的情绪。

黄小峰在书中不断发现“是”，认真探讨“不是”和“所是”，注重发掘事物之间的联系。宋徽宗的《祥龙石图》创作意图是什么？黄小峰如做侦探推理，将祥龙石、枇杷、石菖蒲联合起来，展现以奇石为核心的多种景观，环环相扣分析祥龙石所占据的空间、顶部的平台、盆景中的石菖蒲各自的含义，得出“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更大的祥瑞景观”的结论，观点的逐步生成可谓抽丝剥茧。在“身体”一辑，黄小峰对《浴罢图》《岁朝图》《蕉林午睡图》《农闲平话图》的介绍突出的是“心像”，力争摄取事物的本质。浪游者、颠狂者也好，名士也罢，哪怕贩夫走卒，无不重视肉身！黄小峰越过中国人羞怯内敛的迷障，以洗澡、乘凉等细节展现生命的瞬间感受，以形写神，并达到了形神完足。这是读者近距离领悟世界的有效途径，黄小峰认为这几幅画作饱含感性的迷醉和崇尚，其意在崇尚身体和精神的同步升华。

聊书



作为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的段渝对三星堆的打量视角显然与考古学家们不同，他从已经发掘出土的文物中提炼出三星堆文化的脉络与走向，又用造型不一、技艺精湛的出土文物反过来诠释三星堆文化，在反复论述中，段渝呈现给了读者一幅既令人遐想，又令人神往的文化意义上的三星堆图景。

多种因素形成了三星堆文化

三星堆文化的发现可以追溯到近百年前。1929年，四川广汉县一座老宅旁偶然发现了大量玉石器，这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三星堆文化自此渐露端倪。

三星堆文化是长江上游地区最早的古代文明，它的初创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稍晚于中原夏王朝；它的终结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相当于中原商王朝的晚期。如此算来，作为雄踞西南的古蜀文明连续存在千年之久，对于一个文明古国或者古王朝来说，这种情况在中国古代史上并不多见。

正因为时间跨度大、文化底层的厚，段渝《发现三星堆》对古蜀文明的叩问才会显得有的放矢，对古蜀文明的梳理才能底气十足。

是什么原因创造了三星堆这个让我们这些后来人觉得不可思议的古代文明呢？在《发现三星堆》中，段渝首先提纲挈领地给出了他的答案，“古蜀之所以能在距今三四千年前就创造出如此辉煌的古代文明，这与它深深地根植于博大而深厚的基础分不开，即它是立足于农业的长足发展、手工业的巨大进



步、商业贸易关系的广泛建立、科学知识的积累创新，以及与其他古代文化的密切联系和交流。”

这一小段结论式的分析与总结虽然夹在书中前部并不起眼的位置，但它却对全书的谋篇布局起到了统领作用。

比如说，在“手工业巨大进步”的阐释上，段渝就借助大量彩色、充满细节张力的图片，比较了南北地区对黄金制品在图案细节上的异同。“与北方诸系统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黄金制品在南方系统三星堆文化中具有极高、

极优越的地位，其地位甚至超乎青铜制品之上。”

对黄金制品的推崇备至，是不是意味着三星堆文化要高于同时期的商文化呢？

段渝又从具体实物转向了对文化的分析。他特别指出，情况并非如此，二者之间的差异只能反映两种文化价值取向的不同，而不能表示二者文明发展水平的高低，“因为人们赋予黄金和青铜不同的文化内涵和价值，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尤其不同文化之间所存在的这种差异，当更无足奇怪。”

段渝还举例子，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型青铜器中，没有发现象征着权力的青铜鼎，历史文献中也没有鼎的只言片语的记载，取而代之的是杖。这又说明了三星堆文化与商文化的差异。也就是说，无论在古代蜀人的观念中还是在实际政治生活中，鼎都处于并不重要的地位，这些古人绝没有把它当做权力与财富的象征。

与中原文化既独立又有交流

在对文化差异毫不避讳的同时，段渝在这本20多万字的《发现三星堆》里，着墨更多的是三星堆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交融及相互影响，这恰恰证明了中华文明自古至今“多元一体”的特性。

段渝将已成定论的结果呈现在了读者面前，即夏商时代的古蜀文明，是一种高度发达的神权文明；夏商时代的古蜀王国，是一个行使神权政治的国家，三星堆遗址便是这个神权文明的政治中心之所在。

一种考古学文化绝不是横空出世。就“三星堆”这个神权政体而言，它是在自身高度发达的新石器文化基础上，在文明诸要素不断产生的基础上，主要吸收了中原夏商文明和长江中游